

# 美國的內部分裂與民主制度的「超穩定」



筆者作為中國史的研究和教學者，遲至2016年前後才真正開始關注美國國內政治和社會，由於生活在對決定美國大選結果的選舉人票至關重要的賓夕法尼亞州，而又正好居住在賓州裏全球化對傳統產業衝擊最大的西北部匹茲堡 (Pittsburgh) — 伊利 (Erie) 一線 (兩城市以州際公路I-79南北向相連)，距離另一衰落的老工業基地俄亥俄州也非常近，因此得以近距離地在日常生活中接觸這一帶不少白人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支持者 (或曰「川粉」)，並親身體會當今美國由於種種原因正在形成的內部分裂和政治極化，但是筆者仍然不贊同美國將陷入「內戰」的看法，而相信美國將沿着巨大的歷史慣性維持其總體穩定以及並不均衡的活力。

## 一 美國內部分裂的原因：氣候、產業和交通

自2000年夏天初抵美國之時起，筆者先後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紐約州奧本尼市 (Albany)、賓州西北小城克勞福縣 (Crawford County) 的米德維爾 (Meadville) 生活過，曾多次到訪紐約市，也去過辛辛那提、華盛頓、波士頓、芝加哥、新奧爾良、舊金山、費城、休斯頓、達拉斯、聖路易斯、奧馬哈等城市，以及其他不少州份如新澤西、北卡羅萊納、科羅拉多等，甚至專門探訪過已經成為旅遊勝地的美國少數族裔阿米什人的定居點；不僅乘坐過飛機、火車、灰狗大巴 (Greyhound)，更自駕到過各州大小城市，對美國的國土廣袤，地廣人稀，內部發展既多元又不均衡，確實深有體會。當然，這也許是大國固有的問題，即很難真正實現內部的均衡發展。

然而，由於美國長期對外展示一種以好萊塢電影中的郊區中產階級家庭、肥皂劇中不是住在紐約就是住在芝加哥的公寓裏的年輕人，或者艾倫 (Woody Allen) 電影裏饒舌的大都市知識份子為典型的形象，外界 (在很大程

度上包括很多美國人自己) 逐漸忽視美國存在一個巨大的充滿生存和精神危機的「鄉下人」(hillbilly) 群體，因為付不起遞增的房租而被「掃地出門」(evicted) 的邊緣人社會群體，直到美國學者和有親身經歷的成功人士近幾年才通過相關著述揭示出來<sup>①</sup>。而筆者通過所關注的一些微信公眾號發現，當一些中國中產階級旅行者能夠像過去在中國常見的西方背包客那樣自由地在美國遊走，他們很快看到，「真實的美國」其實包含無數個破敗衰落的小城鎮、蕭條的市面、上百年的舊建築、固守家傳老店的店主，而這一切和影視媒體裏的美國完全不同。筆者在新冠疫情期間上網課，才知道很多住在小鎮的美國學生一旦回到家裏，同樣會面臨上網的困難，他們的內心也和中國的「小鎮做题家」一樣，希望擺脫那個被親戚網絡包圍、對外界充滿恐懼和疑慮的故鄉，或者期盼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去改變鄉親的認知。特朗普的崛起，使得全世界的目光開始關注因全球化導致的產業外移而陷入失業困境的「鐵鏽帶」(Rust Belt) 產業工人群體，以及內陸鄉村地區的「紅脖子」(Redneck) 群體。

從「認識美國」的角度，筆者的確認為，美國人通過大眾媒體製造了一個虛幻的以都市精英為主流的「符號化」美國，而過去十年種種反映美國亂象的作品確實展示了一個更為真實的、在影視劇包裝以外的現實和複雜多面的美國，只有把這個美國形象和大都市、高科技的美國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看到一個完整的美國。當然，在這一意義上，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是內在分裂的，因為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完全彌合種族、階層、教育、地域之間的區隔乃至鴻溝，使所有人都生活在類似的狀態中。在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這樣的內部隔絕和分裂狀態其實是正常的，只是美國人自己也需要從聚焦都市精英、虛構科幻、「超級英雄」的自我麻醉式影視作品中抽離出來，真正面對現實。

在筆者看來，現實中美國的一個特點是，氣候原因和政策因素驅使大量產業從北部的五大湖 (Great Lakes) 區域移向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州、南部的德克薩斯州，以及東南部的佐治亞州和佛羅里達州。這一趨勢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逐漸開始，以至於2023年美國人口和經濟增長最快的十五個城市中，十二個都位於從西南海岸貫通到東南海岸，覆蓋整個南部沿海地區的「陽光地帶」(Sun Belt)<sup>②</sup>。從經濟地理的角度看，北部的賓州地處嚴寒，其西北部靠近五大湖中的伊利湖一帶，冬天備受湖泊效應帶來的雪暴影響，應當是其傳統產業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但這一因素必須放到美國經濟技術重心向南、向西遷移的長時段中加以考察。此外，地理和氣候因素對人的心境也有微妙影響。筆者在紐約、紐約州府奧本尼、匹茲堡、亞特蘭大、達拉斯、休斯頓等多地參加會議、旅行和私人觀光都借助優步 (Uber) 作為交通工具，其間可以明顯感覺到，南部諸州的司機多開朗健談，北方城市的司機則多沉默壓抑，不愛交流。而休斯頓和達拉斯等南部大城市的司機中很多都是來自中東、阿富汗、拉丁美洲的新移民，他們更愛坦誠交流，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正因為這些城市的活力和機會更能夠吸引大量新移民，並進一步加強這些地區的文化多元，才能夠稀釋傳統保守白人的影響。美國南方和北方之

間已經持續和不可逆轉地出現了縱向的分裂。在美國地圖的橫軸上，矽谷的興起和華爾街金融業的全球影響，使得資本和人才不斷向東西兩個海岸聚集，而把廣大中西部內陸地區甩在後面。矽谷所在的加州和華爾街所在的紐約市同時又匯集了全美國最頂尖的高等教育機構，長期持續地吸引知識人才定居，為美國社會注入活力。

全球化進一步加速了這種分化，不僅使得產業在美國國內由北向南遷移，還進而遷到海外。距離筆者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大城市是曾經的鋼鐵之都匹茲堡。由於自由派思想及其政治代表民主黨獲得優勢，當地工會的勢力在勞資關係的博弈中逐漸佔了上風，這直接導致了1959年的一次長達116天的鋼鐵工人大罷工，而這次罷工的直接結果，就是匹茲堡這個鋼鐵之都開始從日本進口鋼材。此外，筆者所在城市米德維爾的一家拉鍊廠則遷移到中國。這種為尋求降低成本而「逃離」的做法在1970年代末期獲得了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行政總裁（CEO）韋爾奇（Jack Welch）強有力的理論支持。韋爾奇認為，大公司首先應該對股東而非僱員負責。因此，公司應該通過遷移到運營成本最低的地方，尋求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潤的最大化<sup>③</sup>。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生產交通工具（例如電氣火車頭）的部門——通用電氣交通運輸公司（GE Transportation）總部就位於距離筆者居住地只有幾十英里的伊利市。據當地媒體報導，這家位於伊利的公司，其工廠的僱員已經從2015年的18,000人減少到2018年的4,500人，並遷移到德州的沃思堡市（Fort Worth）<sup>④</sup>。這和上文試圖提示的一樣，美國內部經濟布局的改變對工人的衝擊，可能遠遠大於政客所渲染的「中國人搶走我們的工作機會」<sup>⑤</sup>。然而，美國大公司管理者自己倡導的外包合理敘事，卻並未被美國工人質疑。據估計，自1978年以來，美國CEO的薪酬增長了1,322%，而同期普通員工的薪酬僅增長了18%<sup>⑥</sup>。在美國人的文化心理中，普通人對於本國的精英階層和大資產者可以說是「敬畏」的，難以形成對薪酬比例不合理的質疑，卻很容易把失意傾瀉到其他國家的頭上，或者說，部分美國人仇外卻不仇富。

影響美國社會文化和心理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交通。筆者經常在中美兩國之間往返，下意識比較後認為，鐵路客運在美國的衰落使得美國內陸更加閉塞。美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掀起修建鐵路的高潮，在筆者居住地米德維爾市中心的市場就是當年的火車站，目前仍有舊照片陳列展示。隨着汽車的普及、高速公路的興起，以及民用航空的平民化，本市火車站早已廢棄，而伊利的火車站亦沒有專屬停車場，候車室冷冷清清，從這裏乘坐國家鐵路客運公司（Amtrak）火車，體驗等同於中國大陸過去的那種慢車，幾百公里要晃晃悠悠走上十幾個小時。同樣，從伊利到紐約的路途，如果放棄緩慢的火車，改由自己開車，將有幾百公里行駛在很長時間都沒有出口、漫長的東向I-90公路上。長途駕車的疲憊、安全問題、加油和停車的成本，都成為自駕旅行不得不考慮的因素，而青少年未持駕照和駕車經驗不足等問題、老人專注度降低影響駕駛等安全性考量，更成為制約這些美國人外出旅行的重要因素。

假如選擇乘飛機出行，即使像匹茲堡這樣較為知名的中型城市，去很多其他城市也要轉一兩次機，起飛時間不是半夜就是凌晨，且從距離匹茲堡有一定路程的地方去機場，必須花很多時間在路上，也缺少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供選擇；再加上繁複的機場安檢，頻繁的航班延誤、取消乃至航空事故，必然導致小城鎮居民外出旅行意欲下降，從而更加封閉在自己的小世界裏。這和亞洲國家公共交通發達，特別是中國的高鐵網絡聯通很多大中小城市，使得一般市民、農民、學生出行都十分便利，形成鮮明對比。當一些中國人驚異於美國人對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時，可能沒有考慮到，大多數生活在內陸鄉村的美國人，出遠門的便利程度其實是遠遠不如中國人的，因為真正能結合價廉、快捷、安全和方便這幾個優勢的長途交通工具，還是經過技術升級以後的鐵路。

## 二 社會分化的重要變量：高等教育

美國內陸的大量普通人其實生活在一種子承父業的循環中。理髮師的兒子學習理髮，木匠的兒子繼續做木匠，砍樹修枝是傳承三代的產業。在熟練技工和體力勞動報酬較高的情況下，一部分人（特別是男性）在高中畢業以後選擇入讀職業技術學校，或者把家傳的技藝和現代職業技術培訓結合起來，而不再接受收費愈來愈高、價值和回報也愈來愈被美國社會懷疑的四年制高等教育。但在筆者看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之所以呈現較多支持特朗普的現象，原因並不全在於經濟貧困，因為相關統計已經顯示，特朗普支持者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為72,000美元，高於美國家庭中位年均收入<sup>⑦</sup>。

由此看來，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貧窮的白人這一假定並不成立。這裏涉及的問題是由於勞動報酬較高，美國確實存在高學歷低收入、低學歷高收入的現象，把特朗普支持者簡單看成失業的產業工人和低收入人群肯定是不準確的。例如，大學文科教授一般來說收入不高，但支持特朗普的極少，原因在於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對全球化和多元化理念的接受，和特朗普鼓吹的白人民粹主義格格不入；而不少收入高於大學文科教授的白人，則完全可能因為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加上受到男權主義、種族主義和排外情緒的誘導而支持特朗普。因而，核心問題是和教育程度呈一定正相關的個人理念取向。

筆者在2020年曾經做過一項小型考察。通過對比2020年總統選舉地圖和2019年美國人口普查資料，發現選舉地圖標記為紅色區域的縣（選共和黨特朗普的佔多數）所包圍的幾個藍色縣（選民主黨拜登[Joe Biden]的佔多數）有一些共同特徵，從某種程度上可以印證族裔和教育程度對人們的選舉行為有相當影響<sup>⑧</sup>。筆者首先挑出在賓州內部顯得並不典型的費城縣（Philadelphia County），這個支持拜登的大都會區呈現出美國很多大都市的共性。在這裏，

白人佔41.2%的人口比例；如果進一步細分，排除拉美裔之後的「純白人」（人口普查資料稱為“white alone, not Hispanic or Latino”）僅佔34.6%，而非裔佔了42.3%，亞裔佔7.2%。或許複雜的種族背景使然，儘管這個縣受過大學教育、持有學士學位者僅佔28.6%，但對白人至上意識形態的反感成為決定多數人支持拜登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縣選擇拜登的選民比例高達81%。

而在支持拜登的其他賓州縣份，特別是那些內陸鄉村地區，非白人的種族身份不再是一個決定性的變量，因為白人佔了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地區的受教育程度、國際化程度、與外界的聯繫則成為選舉行為中非常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以中央縣(Centre County)為例，白人的比例高達87.9%，除掉拉美裔仍高達85.4%，但因為這裏是賓州州立大學本部校區所在地，學生人數共四萬多，教職員人數接近九千人，佔該縣十六萬人口中接近三分之一。這樣高學歷的地區（全縣持有本科以上學歷的居民高達44.7%），學歷、多元文化和國際化等因素對選舉行為的影響更大。筆者曾經在賓州州立大學所在的州學院鎮(State College)住過兩天，此處各式餐館林立，街頭人來人往，是一個典型的開放、活躍的大學城，其政治傾向可想而知。賓州州府所在的多芬縣(Dauphin County)純白人佔64.5%，持有學士學位者佔居民的30.5%。這裏也是著名巧克力生產企業好時(Hershey's)的總部，其巧克力博物館以及資助的助學項目和醫學院都建立於此。筆者曾駕車攜全家訪問此地。這樣一個擁有政府部門、大企業的熱門旅遊目的地和活躍都市，同樣成為支持拜登者略佔多數(53%)的地區，但被周圍的鄉村紅色區域包圍。

在擁有名校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匹茲堡大學及其附屬醫院，以及美國鋼鐵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等一些著名企業的阿勒格尼縣(Allegheny County)，純白人比例為78.1%，擁有大學本科學位的居民達40.7%。這個縣同樣是一個被紅色區域包圍的藍色孤島，選擇拜登的比例達59%。從匹茲堡向北，穿過一片紅色鄉村區域到美加邊境的伊利縣(Erie County)，則又是一個藍色區域，純白人比例為84%，有本科學歷者為27.7%。這裏有賓州西部大學愛丁堡分校(PennWest Edinboro)等幾所大學，有一個小型的國際機場，有仍在生產火車頭的通用電氣交通運輸公司，但如前所述，因該公司大量裁員，也有大批失業藍領工人。選特朗普和選拜登的人在這個縣數字非常接近，選拜登的人數略微佔優。

筆者生活和工作的克勞福縣可以算是低學歷白人選擇特朗普的典型。這個縣純白人人佔比高達94.6%（一位美國白人同事稱為「族群沙漠」[ethnic desert]），但持有學士學位者僅佔20.8%，這些人集中在規模不大的大學和醫院中，由於人數少，可能無法形成像賓州州立大學那樣的選舉影響力。在這種人口和學歷構成下，佔壓倒多數的居民是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2020年大選中克勞福縣對特朗普的支持率高達68%。周邊的紅色縣情況也基本如此。在受過大學教育者僅佔人口比例17%的臨近的韋南戈縣(Venango County)，70%人口支持特朗普。

由此可見，在典型的白人人口佔絕對優勢的美國內陸鄉村地區，地方的國際化程度、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政府和大企業僱員，是否有規模較大的大學和醫院）、對外界的了解和興趣度，與選民是否選擇特朗普之間確實有明顯的相關性。學歷愈低、心靈愈封閉的人群，愈容易進入反智、任性、暴躁和狂熱模式，失意時也愈容易相信特朗普的宣傳，而特朗普言語中慣用的攻擊、羞辱、威脅極大地迎合了這部分人的仇外傾向。受強調多元開放的知識探求以及批判性思維的高等教育影響的人群，則更容易在政治立場和價值觀上偏向民主黨的主張。正是大學為美國學生提供了廣泛的人文教育，與不同族裔、國籍及背景的學生相處，體驗多元文化，理性和包容地認識外部世界，以及重塑世界觀的機會；也正是因為美國大多數的公立高中不存在外國背景教師，而美國大學總體上積極聘用外國背景教授，能在知識以外給學生帶來更加獨特的視角、觀點和人生體驗，從而使學生在一個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時代通過克服「封閉的美國心靈」而受益。

生活在相對封閉環境中而又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容易相信特朗普這類政治人物的煽惑。政治學家劉擎經由解讀米勒 (Jan-Werner Müller) 《甚麼是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 的核心要論，揭示了特朗普主義 (Trumpism) 在美國內部運作的實質，即特朗普在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的同時，不是把自己看作一個理性的提出對策的人——像過去的總統那樣——而是把自己包裝成「代表全體人民」的唯一救主，是來「拯救」美國的，「民粹主義的『界定性特徵』(defining feature) 不是反對精英，而是對『人民』代表性的壟斷：民粹主義者們宣稱，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這種對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壟斷才是民粹主義的獨特之處」<sup>⑨</sup>。筆者認為，特朗普正是把總統這一行政職位塑造造成救主的道德形象，把理性基礎上的總統候選人政策辯論變成情緒性的相互攻擊辱罵。這種「只有他才代表」的道德幻覺導致特朗普有恃無恐，一再突破總統競選政策辯論的慣例。

論者對特朗普「特權民粹主義」的解讀則有助於我們在另一個層面理解特朗普的策略，以及為甚麼美國中西部失意白人容易被特朗普煽動<sup>⑩</sup>：

特權民粹主義是指在民粹主義話語中，相對特權群體將自己描繪成為被剝奪地位的受害者，以此來掩蓋他們在社會和國際上的相對優勢地位，並通過強調集體創傷將異質群體團結在一起，使他們感到由於國內和國際精英的勾結，他們共同享有的特權受到了威脅。特朗普的反華民粹主義符合特權民粹主義的定義，他將相對特權和支配群體描繪成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受害者，同時將外部勢力描繪成對他們的威脅。具體而言，特朗普作為特權民粹主義的代理人，聲稱中國「威脅」了美國的國際地位，對「普通美國人」造成了傷害，從而構建他們的「受壓迫者」這一弱勢群體身份，掩蓋了美國人民在國際上的優勢地位。

在這裏，研究者揭示了一個重要現象，即美國內陸白人的「受害人意識」和「受到威脅的恐懼感」是一種偽意識，而特朗普在一個本來擁有種族特權的群體中煽動他們相信自己才是受害者，誘導這一群體不去質疑美國國內貧富不均、企業高管年薪畸高，而把矛頭指向其他國家，正是極大利用了這一群體信息不足、思想封閉、不善於深度思考的弱點。

### 三 為何僱不到人：「製造業回到美國」的兩例

基於前述對「美國人被搶走工作機會」的抨擊和美國內陸白人的「受害人意識」，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美國總統後，大力提倡「製造業回到美國」<sup>⑩</sup>。然而，製造業之所以離開美國，其根本原因就是生產成本（特別是工資）太高、勞動保護要求太嚴苛，這是企業所有者和管理層與普通員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而且不會因為製造業回流而消失。事實上，即使郭台銘在2017年高調把鴻海科技集團（富士康）的生產基地拓展到美國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或者張忠謀創立的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開設工廠，都沒有真正解決當地人的就業問題。

2017年，在特朗普的見證下，郭台銘斥資100億美元，並以稅務減免形式獲得30億美元威州政府補貼，開建75英寸電視機用液晶顯示屏（LCD）工廠；一年以後，已經獲得超過40億美元州政府補貼的富士康開始退卻，宣布建設一個以機械取代人力的小型LCD生產工廠，而許諾的15,000個給美國人的工作職位則據說留給一個「神秘的、充斥流行語的生態系統項目，名為“AI 8K+5G”」<sup>⑪</sup>。

LCD生產過程中涉及流水線上的好幾個工位，每一個工位負責一個步驟，其中有的工作簡單到只需不停安裝LCD邊框，而工人則需要在封閉的無塵車間裏長時間站立工作。以筆者對美國中西部白人個性的了解，並不相信他們能夠在這種狀態下長期機械地工作。在美國現代史上，幾乎所有高度繁瑣而簡單的工作都由新移民擔任（如二十世紀初期曾發生過歐陸移民製衣女工宿舍失火的大案<sup>⑫</sup>）。當代美國人一般傾向於從事時間安排上有更大靈活度，工作中個體活動較為自由、更多和他人有交流、又相當大程度需要做出自我判斷的工作，如較多男性從事的電工、水管工、建築裝修、汽車修理，或者較多女性從事的調配咖啡、侍應等。這些工作都給予工作者相當大的個人自主和靈活性，例如水管工診斷出水管問題，並找出解決方案，接到預約才前赴工作；咖啡店員工滿足顧客對咖啡品類和奶糖的個體化要求，還能與顧客進行短暫交流；在餐館做侍應生，既可與人交流，滿足顧客的個體化需求，又掙到高額小費。同時，美國人也喜歡從事一些追求個人激情（passion）的志業，如創意寫作或藝術。一個普通的美國白人青年應該沒有任何興趣終日站立，反覆裝配LCD邊框，這類工作的確只適合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民眾為生活所迫養家糊口的需要。

假如美國的富士康工廠出於人力資源有限和節約成本的意圖，轉向自動化生產和機器人裝配，這對於已經獲得威州政府巨額補助的郭台銘來說當然是好事，只要他能成功盈利即可。但問題在於這個項目的初衷不只是為了讓郭台銘換一個地方賺錢，而是美國地方政府為了響應特朗普「製造業回到美國」的呼籲，解決自身就業問題而進行的招商引資<sup>⑭</sup>，而前述的機器人車間計劃將進一步使工廠最初承諾的就業崗位成為泡影。這一事例說明，勞動密集型工廠集中大量人力從事生產，簡單、枯燥的流水線裝配工作的性質不適用於地廣人稀的美國內陸地區，也不適合大部分美國人散漫、好動、愛說話和交流、喜歡自己做主的個性。如果轉為以機器人裝配，雖然技術上可行，能節省成本，卻又違背了提供就業機會的初衷。對富士康日漸懷疑的美國記者在調查報導中指出，截至2023年3月，富士康只在當地僱傭了一千人<sup>⑮</sup>。然而美國記者似乎沒有想去追問，富士康為甚麼僱不到人，而那些積極呼喊讓「製造業回到美國」的民眾，又為甚麼不積極申請為富士康裝配LCD。事實上，裝配工作在今天很容易被機器人取代，企業需要掌握高技術的人才而不再是傳統產業工人，即使美國企業回流也將加入這一大潮，因此傳統藍領製造業的復興本質上是一個偽命題。

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所面臨的卻是另一個問題。2020年5月台積電宣布赴美設廠，投資650億美元並獲得美國聯邦政府撥款66億美元資助，園區建成投產後計劃僱傭6,000名員工，但後來實際僱傭的2,200名員工中，一半來自台灣，因為美國本地員工大量流失。在美國員工看來，他們被僱主「虐待」(abuse)。美國媒體的相關報導指出，「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於，台積電一直試圖在美國按照其在台灣的方式做事。在台灣，台積電以工作條件極為嚴苛聞名，包括其每天十二小時工作制、周末加班，以及半夜緊急呼叫員工趕工。台積電在台灣的經理人員也以苛待及因小錯威脅解僱員工而聞名」<sup>⑯</sup>。美國媒體的負面描述顯示，即使製造業回到美國，但假如奉行東亞式的嚴苛管理和強調奉獻的「加班文化」，仍然會水土不服，因為美國員工不會願意接受這樣的待遇。當然，台積電和富士康之間的一個區別在於，把芯片生產從台灣轉移到美國本土，是涉及美國國家安全的一項戰略舉措，並受到2022年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加持。

#### 四 分裂、極化但不會內戰：美式「超穩定結構」

在2024年的美國大選中，美國內部的嚴重分化和撕裂已經呈現在世人眼前：一個守舊、傳統，更傾向孤立主義、更強調男性中心，甚至更推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美國，以及一個更加包容、開放、多元、世俗化的美國及其願景與行動。兩者之間的較量，顯然已經超越了滿足部分失業藍領工人訴求的狹小和短期目標，而涉及美國自身的定位和未來走向的問題。

然而，筆者並不認為美國有真正陷入內戰的可能，也不認為美國民主制度本身面臨致命危機。儘管2021年1月6日爆發了震驚世界的衝擊國會山事件，但這一事件終究不是一場有統一組織的計劃，也不是具有持續性的社會政治運動，其訴求基本集中在大選舞弊這一虛構的敘事上。雖然參與衝擊者幾乎完全符合筆者前面所提到的特朗普支持者的特點：受特朗普煽動、來自內陸中小城鎮和鄉村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以及「驕傲男孩」(Proud Boys) 之類的白人極右翼組織，但這場騷亂始終被美國主流社會譴責，後續的處理完全被納入正常司法程序，反對特朗普的人完全無需(或許也不屑於)和這些特朗普支持者中的極端暴力份子正面衝突。而與之相比，十九世紀的美國內戰則呈現一種完全不同的圖景：自1861年起，試圖從美利堅合眾國分離出去的一些南方州份開始陸續退出聯邦，並成立了美利堅聯盟國(邦聯)，直到1865年被擊敗，這個由十一個蓄奴州組成的「國家」擁有自己的國名、國旗、領土、民眾和總統。按照筆者一名研究美國內戰史並有專著出版的同事的看法，當時南部十一州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nation)。儘管這一觀點在筆者看來過於偏激，但南方州在短暫的幾年中具備作為一個「國家」(state)的諸制度要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因而，真正能導致美國爆發內戰的條件在今天已經不復存在。

雖然美國存在前述各種因為地域、城鄉、種族、經濟水平、教育水平、信息來源、政治視野和價值觀，以至全球化衝擊等因素形成的種種分歧，以及由於特定政治人物人為煽動和操弄民粹而形成的對立乃至極化，但放諸全球，以美國面積之大、人口之多、種族和族群之複雜、內部歷史積怨之深厚、貧富懸殊之劇烈，這一切差異和衝突應該都算是得到有效管控，社會也基本穩定。由於美國採行聯邦制，聯邦和各州政府之間的權限既重疊又區隔，而



普通美國人表達對選舉候選人的支持多數是低調的。(圖片由伍國提供)

且也存在衝突的領域。在2024年1月德州和聯邦就處理非法移民問題產生的衝突中，核心在於德州是否可以自行採取嚴厲措施杜絕非法移民，尤其是德州設置的刺網，阻礙了聯邦邊境巡邏人員工作及接觸非法移民。這一技術性衝突並未升級為網絡上傳言的「內戰」，而是一起典型的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爭議，只是在美國各州自治而德州人又以彪悍聞名的情況下，德州部分政治人物的激進言詞被刻意截取<sup>①</sup>。事實上，要求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完全扁平、和諧，沒有嚴重的對立和衝突，幾乎是不可能的。作為一個民族，在不斷的衝突中談判、協商、

妥協，繼續前行，才是真實的美國。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美國人表達對選舉候選人的支持，在大多數時候是低調的，最常見的就是在自家前院插上寫有候選人名字的小牌子，到了投票日默默去投票，而競選集會上的狂熱並非日常的狀態。

筆者認為，下列幾個因素至今仍然把內部分裂和政治極化的美國有效統合在一起：第一，美國既是世界上軍事和金融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也是最具科技創新能力的國家，全球頂尖科技公司和頂尖大學大多集中在美國。這一絕對性優勢使得美國民眾心中依然充滿作為美國公民的自豪感。儘管可以承認，美國落後閉塞的一面與發達光鮮的一面形成鮮明對比，美國的槍支暴力、毒品泛濫、反智主義也和它的優質教育形成對比，但筆者在美國生活二十多年，深感美國文化本來就有追求極致或走極端的一面，平和中庸絕不是美國的性格，這或許就是為甚麼馬斯克 (Elon R. Musk) 這樣介於天才和瘋子之間的精英能夠在美國如魚得水，因為美國在制度上就是為把事情做大的精英準備的；而另一方面，普通民眾也能極大地容忍經濟上的不平等，因為在他們心中，一個CEO能掙到那麼多年薪，必然是因為其智商高，具卓越領導能力，因而有資格掙到巨大的財富。

第二，美國人從其先祖登陸北美荒原起，就有一種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倔強和進攻性；從美國在二戰期間宣告孤立主義政策終結、開始走向世界舞台的那一刻起，就不斷地打擊敵人，在戰爭（美西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中一次次提升國際地位。這在美國民眾中形成了一種同仇敵愾、抵禦外敵的潛意識。當然，中國本無意也不應該成為美國的對手，但是這種競爭認知一旦形成，不論是爭得你死我活的民主、共和兩黨還是兩名總統候選人，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都會變得大略趨同，希望維持美國在未來兩強競爭中的優勢，讓美國繼續偉大，或「再度偉大」，差別只是方法和策略，以及對「偉大」的定義。筆者回憶起2001年在美國親歷「9.11」恐襲的震盪時，學校停課後回到公寓裏，打開收音機收聽的叩應 (call-in) 節目裏沒有謾罵和詛咒，沒有嚎啕大哭，而是一次次的“pray”（祈禱），普通民眾自發默默在房屋外掛出小國旗。在這一年的美國獨立日，一名研究生同學在群發電郵中，把美國稱為「自羅馬帝國衰亡以來最偉大的國家」。筆者至今仍記得當年讀到這段句子時的感慨。

第三，在目前動盪不安的國際局勢下，美國自認肩負領導全球的責任，對自身危機、陰影保持自省與警覺，都使得美國不可能進入一場除了削弱自己之外別無意義的內戰。對此，美國人是清醒和有大局觀的。美國不少大學的辦學宗旨就明言要培養全球領導者 (global leader)。至少在三個全球性大問題上，美國人有着超越黨派的共識：首先，反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並始終把俄羅斯視為一種異己的文明和地緣政治力量；其次，對中國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實力和意圖保持警覺，對中國持續增長的軍力具有普遍的恐懼和憂慮。在筆者今年10月參加一個亞洲研究學術會議期間，一位參會美國學者向筆者解釋說，美國人對中國的恐懼和焦慮來源於對越南戰爭、「9.11」恐襲和

反恐戰爭的創傷記憶，因此美國民眾非常害怕進入一場與中國交鋒、戰火可能波及美國本土的戰爭。這一視角當然也有助於我們對美國強悍形象以外的脆弱一面進行思考。再次，在中東問題上始終站在以色列一邊。這些涉及美國全球地位的大是大非都足以超越內部分歧。

第四，在筆者的長期觀察中，美國內部文化存在着也許被很多中國的研究者忽視的「宿命論」。這種宿命論相信人的先天智商決定其成功的程度、適合從事哪些工作，也相信人的能力決定其應得的待遇——正是這一點解釋了普通美國人何以容忍大企業CEO的年薪數百倍高於自己，而並不仇富，只是轉向反智和排外。也就是說，中下層美國人在面對權力和財富時的無力感以及瀟灑的一種認命的消極情緒，或者對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意義上的統治階級顯性和隱形「霸權」(hegemony) 的屈服，以及這一霸權本身的足夠強大，是美國社會總體能維持「超穩定」的另一個關鍵因素。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對華爾街沒有絲毫撼動，組織者反而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的監控和打擊<sup>⑩</sup>。回到筆者的第一點，還可以說，在崇尚激烈競爭、追求極致的美國，過得很一般或者不太好的人基本上 (或者被視為) 安於現狀或放縱墮落，而這正是萬斯 (J. D. Vance) 2016年暢銷書《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中內陸「鄉下人」文化意義上的真正「悲歌」。

第五，無論美國人之間有多少內部衝突和敵對情緒，對法治 (rule of law) 的珍視和尊重仍然是絕大多數人的共識。2024年9月，一項覆蓋了1,046個美國家庭，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結果顯示，幾乎所有美國人都認識到法治的重要性；絕大多數人繼續強烈表達他們支持法治的個人價值觀；數百萬民眾對2024年大選中至關重要的選舉和司法官員抱有信心<sup>⑪</sup>。一個明顯例證是，2021年的暴力衝擊國會山事件最終在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危機並未陷入當時很多人擔心的內戰。值得注意的是，衝擊國會的根本原因在於騷亂者相信了大選舞弊的說辭，這同時從側面證明，合法、公正、透明的選舉過程是騷亂者的訴求，儘管他們的行為違反了法律。

因此，筆者認為不必誇大美國內戰的可能性和其制度面對的危機。就美國民主憲政制度的運作而言，除了極少數如特朗普那樣的另類政治人物攪局以外，美國政治未來終將回歸正軌，沿着巨大的歷史慣性，在自身已經形成的某種「超穩定」結構中蹣跚前行。筆者借用金觀濤和劉青峰教授著名的「超穩定結構」理論描述美國，並非強調其凝滯，而是標示其大體穩定性<sup>⑫</sup>。在這一結構下，美國在理念上有某種自我賦予的宗教使命感、全球領袖意識，以及建國先賢創立的民主政治理論和華盛頓式的道德典範；在制度上有成熟的政黨輪替、總統選舉規則、任期限制和三權分立的相互制約；在經濟上有強大的金融實力 (包括美元霸權、匯率優勢和長期穩定上揚的股市) 保障民眾不會因為經濟下滑而人心惶惶。而民眾能夠參與投票，也使得不滿情緒有「安全閥」疏解。此外，「智商決定論」等宿命論人生觀以及精英統治階層「霸權」的

客觀存在，則決定了低收入階層不會也不敢直接挑戰本國高收入階層的利益，而會把外國視為假想敵——這反而加強了內部團結。美國的大學自覺承擔了社會向上流動的輸送渠道和防止流動阻塞的調節器功能，以及成為鼓勵多元文化並存、培養高素質公民甚至全球領導者的場域。事實上，作為重要的移民目的地，美國仍然吸引着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口。2024年的一項研究顯示，2022年的美國人口中有4,620萬人，即超過人口10%是出生於美國以外的移民，人數創歷史新高，其中有近97萬人在2022年正式歸化成為美國公民<sup>①</sup>。

## 五 餘論

筆者已經進入知天命之年，在美國已經生活了二十四年，從來不是熱衷於選舉政治的人，也深知美國政治背後有太多的利益和金錢因素，如前所示，對美國社會內部的種種局限和痼疾也早已充分「祛魅」。然而，筆者秉持批判性的自由主義理念，同樣相信人類的任何社會形態都是不完美的，在任何有人的地方都會形成不平等的、宰制與反宰制的層層疊疊的權力關係；權力的施用甚至滲透在美國高校的關係結構（行政層與教師、教師與學生、學生與行政層）中。信息的不充分、現代媒體的議程操縱和人類情感的巨大動能，也使得理性公民必定會有效參與民主政治的假定大打折扣。在這個並不完美的世界上，民主或許至少在理論上確認個體有進行精神探索、獲取信息、進行交流，而且免於恐懼的自由權利，並大體上生活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行文至此，剛好讀到美國駐華大使館微信公眾號發布的華裔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朱棣文教授對民主的先決條件的論述：「民主制度需要兩大支柱：享有自由的新聞媒體但要對所發表的內容負責；和可以教給人們如何思考、如何閱讀〔、〕如何做所有參與式民主所必須的事情的學校。」<sup>②</sup>筆者以為，其對新聞自由和新聞職業倫理，以及教育機構和教育者作用的強調，值得所有人深思。

### 註釋

① J. D. Vance,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New York: Harper, 2016); Matthew Desmond,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6).

② “Sunbelt Migration”, <https://vip.cah.ucf.edu/popups/sunbelt.html>; Olga Khazan, “Why People Won’t Stop Moving to the Sun Belt”, *The Atlantic*, 15 August 2023, [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3/08/moving-south-sun-belt-housing-economy/675010](http://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3/08/moving-south-sun-belt-housing-economy/675010).

③ “Where America’s Jobs Went: In a Globalized Economy, American Corporations Are Rapidly Shifting Their Workforces Abroad”, *The Week*, 12 January 2015, <https://theweek.com/articles/486362/where-americas-jobs-went>.

- ④ “GE Transportation No Longer Erie’s Top Employer”, *Erie Times*, 25 May 2018, [www.goerie.com/story/business/2018/05/25/ge-transportation-no-longer-erie/12117337007](http://www.goerie.com/story/business/2018/05/25/ge-transportation-no-longer-erie/12117337007).
- ⑤⑩ Alexandra Homolar、Juan A. R. Casado 著，歐陽昉譯：〈創傷和受害者想像：「中國威脅」在特朗普特權民粹主義中的作用〉（2024年8月22日），騰訊網，<https://new.qq.com/rain/a/20240822A09CSY00>。
- ⑥ 〈美企 CEO 去年中位數收入達 2,000 萬美元，是普通工人 254 倍〉（2022 年 4 月 19 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網，[www.ccpit.org/usa/a/20220419/20220419ua2z.html](http://www.ccpit.org/usa/a/20220419/20220419ua2z.html)。
- ⑦ Sharon Smith, “The Myth of the ‘Rust Belt Reactionaries’” (20 July 2017),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7/07/20/the-myth-of-the-rust-belt-reactionaries>.
- ⑧ 參見 [www.bing.com/images/search?q=pennsylvania+election+map+2020](http://www.bing.com/images/search?q=pennsylvania+election+map+2020); “Pennsylvania: 2020 Census”, [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state-by-state/pennsylvania-population-change-between-census-decade.html](http://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state-by-state/pennsylvania-population-change-between-census-decade.html)。
- ⑨ 劉擎：〈甚麼是民粹主義？〉（2020 年 6 月 17 日），搜狐網，[www.sohu.com/a/402371867\\_756901](http://www.sohu.com/a/402371867_756901)。
- ⑪⑫⑬ Cameron Faulkner,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Foxconn in Wisconsin” (10 May 2024), [www.theverge.com/policy/2019/4/26/18518650/foxconn-wisconsin-factory-lcd-buildings-us](http://www.theverge.com/policy/2019/4/26/18518650/foxconn-wisconsin-factory-lcd-buildings-us).
- ⑭ Jo Ann E. Argersinger, *The Triangle Fire: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Boston, MA: Bedford/St. Martin’s, 2009).
- ⑮ “What’s Happened at the Wisconsin Foxconn since 2017” (23 March 2023), [www.jsonline.com/story/money/business/2023/03/23/what-we-know-about-foxconn-in-wisconsin-and-how-we-got-there/70037738007](http://www.jsonline.com/story/money/business/2023/03/23/what-we-know-about-foxconn-in-wisconsin-and-how-we-got-there/70037738007).
- ⑯ Jeff Butts, “TSMC Arizona Struggles to Overcome Vast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US Work Culture” (9 August 2024), [www.tomshardware.com/tech-industry/semiconductors/tsmc-arizona-struggles-to-overcome-vast-differences-between-taiwanese-and-us-work-culture](http://www.tomshardware.com/tech-industry/semiconductors/tsmc-arizona-struggles-to-overcome-vast-differences-between-taiwanese-and-us-work-culture).
- ⑰ 〈【錯誤】德州宣布進入戰爭狀態？美國內戰爆發？與事實不符的虛構說法〉（2024 年 2 月 2 日），MyGoPen 網，[www.mygopen.com/2024/02/texas.html](http://www.mygopen.com/2024/02/texas.html)。
- ⑱ Naomi Wolf, “Revealed: How the FBI Coordinated the Crackdown on Occupy”, *The Guardian*, 29 December 2012, [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2/dec/29/fbi-coordinated-crackdown-occupy](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2/dec/29/fbi-coordinated-crackdown-occupy).
- ⑲ “Rule of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orldjusticeproject.org/our-work/research-and-data/rule-law-united-states>.
- ⑳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
- ㉑ Jeanne Batalova, “Frequently Requested Statistics on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3 March 2024),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frequently-requested-statistics-immigrants-and-immigration-united-states-2024](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frequently-requested-statistics-immigrants-and-immigration-united-states-2024).
- ㉒ 〈民主的兩大重要支柱：對話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2024 年 9 月 19 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GQdZ2iFEkdoEMuxF4uod9g>。